

“密苏里”号受降仪式上的中国面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美国陆军上将麦克阿瑟被任命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负责安排和主持日本投降仪式,并作为同盟国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代表团团长理应为时任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但他因忙于筹备在南京的受降仪式抽不开身,人选最终落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身上。

徐永昌主掌军令部多年,平时很少抛头露面,但在大本营作战决策上,被认为是既能关照全局,又料事如神的智多星,抗战期间功勋卓著。在徐永昌提议下,原军令部第二厅

(情报厅)厅长、时任国防外事局局长的杨宣诚中将军令部第一厅第二处处长李树正少将加入赴日受降队伍中。加上长期担任驻外武官的朱世明中将军和王不承上校,代表团已有五名成员,还少一位专职联络翻译人员,长期在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部担任首席联络参谋、毕业于西点学校的王之少将成了不二人选。

徐永昌曾就“签受降书次序”“受降典礼时着何式服装”等事向长期跟随麦克阿瑟的王之讨教,后者表示麦克阿瑟必着便服,不戴勋章。但徐永昌认为出席如此重要的仪式



必须注重军人形象,于是着军常服、佩戴勋表成了中国代表团不成文的规定。只有军便服的王之只能在当地找裁缝连夜赶做,以致他的新衣在颜色和料子上都与其他陆军军官的军常服不一样。

9月2日上午8时半,徐永昌登上“密苏里”号主甲板,他穿着一身洁净的哗叽军服,左胸上两行勋绶,向迎接的美国军官举手还礼后,带领成员们拾级登梯走上上层甲板。

“密苏里”号上所有美军官兵,上至五星上将,下至普通水兵,都是制式衬衫的军便装,不系领带不佩勋章,原来是为表达对日军的轻蔑。

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阅兵现场,为战鹰助力,为胜利续航,加受油机梯队飞临天安门上空,三架运油-20A时刻准备为轰-6N、歼-16、歼-20飞机加油。

驾驶运油-20A的女机长刷屏全网,她是来自中部战区空军某部的谭红梅上校。

据了解,谭红梅的父亲谭桂康也曾是一名军人。在他眼中,女儿从小就懂事听话、自律要强,很少让父母操心。

谭桂康说,也许正是自己身上的军人气质,让女儿对军旅生活充满向往。3日上午,在电视直播中看到女儿驾驶战鹰飞过天安门广场,他内心无比激动和自豪。

谭红梅是我国第7批女飞行员,争分夺秒、勇于拼搏是她的代名词。

作为新型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女机长,驾驶过6种机型,执行过各项重大演训任务,用实际行动诠释大国空军女飞行员的铿锵本色。

当时,作为首批改装运-20大型运输机的飞行员,为了顺利完成改装,早日飞上国产

中国代表团之后,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也陆续上船。只见英国代表穿着纯白短袖、短裤和长袜;法国代表本来穿着雨衣,携一根手杖,这时也卸衣去杖,露出一身淡黄色军服;苏联陆军代表穿着淡绿棕色制服,裤管上还镶有长长的红条……

美国代表团仅尼米兹一人,而后是以徐永昌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以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弗雷泽上将为首的英国代表团、以普尔卡耶夫中将为

首的苏联代表团等。签字时,中国代表徐永昌排在尼米兹之后,因他不懂英文,又担心在受降书上签错位置,便要求王之陪同。

当所有人签完字,麦克阿瑟说道:“现在,愿世界从此恢复和平,祈祷上帝永远保佑它。仪式到此结束。”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25年第17期 李崇寒/文)



先进的运输机,空勤宿舍、飞行教室、飞机座舱,构成了她“三点一线”的改装生活。

航理学习遇到难点疑点,她到处翻阅辅导教材,认真做好每一处笔记,每天坚持前往机场,在座舱里熟悉飞行操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在同批中很快实现单飞单放,完成改装,成为为数不多的运-20机长。

对于飞行员来说,每一次改装都是新的进步、新的挑战;作为机长,谭红梅更加严谨细致。一次飞行中,她驾驶运-20遇到复杂气象,飞机不断颠簸,她按照特情处置预案,迅速展开操作,在极短时间内,让飞机恢复平稳姿态。

据中部战区消息,谭红梅的爱人张浩,也是中部战区空军某部的一名飞行员。为同一份事业而奋斗,张浩与谭红梅彼此信任、相互理解,出色地完成了各类重大任务。

2023年,他们的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据央视新闻、上观新闻 汤皓等/文)

阅兵最帅女机长,是她!

排序

程应峰

评优发榜,红纸贴墙,三十个名字自上而下排成两列。有人驻足嘀咕:“怎么他排在我前面?”我循声望去,原来,他把这份按姓氏笔画排序的名单,误认为“贡献排行榜”。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排序方式不同,世界便悄悄换了模样;而人们又总把“次序”误当“价值”,于是生出许多无端的悲喜。

回家打开电脑,随意点开一个文件夹,点击右键——“排序方式”下拉菜单里躺着“名称”“大小”“类型”“修改日期”。按名称:从A到Z像一条笔直的公路,把文件压成一条线,看似公平,其实把“时间”藏了起来——最新写的稿子可能与十年前的旧稿肩并肩,像一对年龄悬殊的兄弟。按大小:体积大的浮上来,小的沉下去。按类型:同类抱团,异类隔离。

按修改日期:最新一次保存跳到最前,像时钟倒转,“刚刚”成为

一场秋天的告白

许道军

爱秋天,但不是爱它的全部——不是爱它所有的好,也不是爱它的时时刻刻。并非无心去爱,只是爱的能力不够。那些宏大的、深刻的、美到令人窒息的、或是转瞬即逝的,只让我战栗,却无法言说。

也没有那么势利,而是因更爱自己而学会节制。相反,我倒是愿意倾其所有,将我,以及我的中年,投入那无边的原野。

并非不信,我所爱之人或事,不再慈悲——拒绝我的白头与过往,也拒绝难言的此刻。而是说,是我的就是我的。草丛中繁花点点,美如天命。

在秋天,我开始愿意分享。万物有主,因果自持——谁播种,谁收割;谁流连晚风,谁便得见落日。在秋天,我愿有人替我坐在葡萄架下啜饮,在星空下书写。雁阵掠过苍穹,许多人抬头时,正见它飞入暮色。秋虫初鸣时,惊心动魄的不止我一人。

不止秋天,春天和冬天也是如此,包括一切美好的事物。爱是欣赏和分享,但直到秋天,我才真正学会无私。

(摘自《今晚报》)

文苑 漫步

王者。昨天的荣耀、前天的泪水,被毫不留情地压到队尾。

盯着屏幕,我想:如果人生也能像文件夹一样,随时换一种排序,我们是否就能看见另一个自己?

有一男孩结婚,喜帖名单排序成了“家庭大战”。按辈分?新娘家堂叔比公公还大两岁。按字母?老家乡亲不会拼音,找不到自己名字。最后,姑丈拍板:按“先来后到”——谁最早送祝福,谁坐前排。一场危机化解,众人鼓掌。看来,“排序”也是一场充满智慧的外交,顺其自然才会皆大欢喜。

母亲住院,内科走廊挤了三排折叠床。按“入院先后”排序,母亲37号;按“病情轻重”排序,她排不进前三;按“年龄”排序,她又处于中间。可凌晨两点,当13床的小伙子痛得直哼,15床的大姐悄悄把热水壶递过去;天亮后,护工来不及打扫,60床的老伯自己摇着轮椅去水

李桂连

房拿拖把。那一刻,没有一种电脑算法能排得出“谁更善良”,可走廊里却自发形成一种看不见的次序:谁更需要,谁就优先得到阳光、热水与抚慰。我发现,脱离键盘与鼠标,人依旧能排序,且排得温情满满。

音乐软件有个按钮:随机播放。它让下一首不可预见,让熟悉的歌单重新长出陌生。人生也需要这样的“随机”:偶尔打破自设的排序,允许意外插队,允许柔软领先。

世界辽阔,算法繁多,关键是我们心里要留一个“随机播放”键——在得意忘形时,让它把你调到后面,看看别人的泪;在自卑谷底时,让它把你送到前排,晒晒自己的光。

排序方式千千万,而生命只有一回。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在不断更换的列队里,守住自己的多维坐标,不急着比较,不困于位置。

(摘自《广州日报》)

送

李辉

下六楼,到楼角转弯处。从沙发上起身,开门,走楼梯下六楼。从沙发上起身,开门。从沙发上起身。躺在地上,侧着头看着我,跟我摆摆手。“我就不起来送你了。”母亲说。

(摘自《新周报》)

良药甘口

李远芳

嘻地望着我说“药甜甜的。”古代医家在方子中加入大枣,不但为了扶持正气,更是为了使汤药甘甜啊。

前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朋友阿思向我倾诉,说她的母亲住院了。她的母亲本就患有癌症,当下又得了流感,病情比较严重。那时,她与母亲正处于很深的矛盾中。矛盾的缘由是她的母亲认为她男友家太远,试图阻止她结婚。

从医数年的经验告诉我,阿思的母亲有可能熬不过这个冬天了。平心而论,她母亲的行为确实欠妥。但人之生死是不可逆的,阿思此时要是没去陪伴,日后极可能会因没有陪母亲共度她最后的时光而悔恨终生。可是,要如何让

第一次和交响乐亲密接触是在1998年秋天,住在城里的大哥邀请我和女朋友去欣赏北京交响乐团的演出。本不懂音乐的我,被音乐中的激昂、悲怆、柔和、悠扬激荡着心灵。从此,我对交响乐开始着迷。

我的爱好也影响了父亲。一年秋天,家乡的稻子又获丰收。那天,我和父亲走进稻田正要开始收割,突然,放在田埂上的收音机里响起了《在希望的田野上》交响乐曲。父亲佝偻着身体说:“这首歌曲怎么都是锅碗瓢盆的曲子,没有人唱呀?”父亲嘴里的“锅碗瓢盆”把我逗笑了。我告诉他:“这是交响乐,演奏的乐器有鼓、琴、笛、管、号等很多种类呢,可不是锅碗瓢盆。”父亲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听起来就是咱们农家要丰收的曲子,是个好曲子,俺喜欢听!”

父亲很少听音乐。回到家,我买了一台随身听,刻了一张这首交响乐的光盘,送给父亲。整个秋天,父亲都是听着《在希望的田野上》收割、脱粒、入仓的。这首曲子,是乡村振兴的颂歌。

(摘自《人民日报》)

烟火人间

她接纳我的建议呢?

我想起了开方子的经验,便对阿思说:“你妈这么做,确实令人很难受。”我和她聊了许久,聊到作为单亲家庭,多年以来她们母女间的相伴与争吵,聊到人性的多面性,又聊到生命的脆弱。最后,我说:“我觉得,你还是回去一趟比较好。”她没再说话。

一个星期后,阿思发来消息:“我该如何感谢你?那晚和你聊完天后,我第二天早上就坐上了回家的高铁。妈妈终于等到了我,如释重负。她看着我笑,和我讲话。昨天,妈妈走了。真的很庆幸,我做了应该做的事,没有留下遗憾。”

此番经历后,我想,那句古话也可以换成:良药“甘”口利于病,忠言“顺”耳利于行。

(摘自《扬子晚报》)

灼见